

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的沿革及其學術活動

The History and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Peking Sino-Fren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葛夫平 (Ge Fuping) *

法國漢學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曾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至漢學被認為是法國的一門學科，各國漢學家大多要到法國去接受這方面的訓練和教育。法國漢學研究之所以能在國際漢學界獨佔鰲頭，除了漢學大師的個人貢獻外，這與包括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內的一些學術機構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一、歷史沿革

在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 (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 1947 年後改為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成立之前，法國已分別在越南的河內和日本的東京設立了漢學研究基地。法國政府之所以於 1941 年 9 月在北京設立中法漢學研究所，這與抗戰爆發後的中國形勢有著密切關係。

1937 年抗戰爆發後，北京被日軍佔領，作為中法兩國文化合作事業的一個重要成果的北京中法大學受到日偽政府的壓制，開始醞釀南遷。為了繼續保持法國文化在華北的影響，同時也為了北京中法大學的校產不被日偽政權侵佔，1939 年 8 月 23 日法國駐京使館領事雷恩

(M. D. Rhein) 向當時在上海的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 (Henri Cosme) 建議在北京設立漢學研究所，他指出：「如果我們讓法國漢學喪失在世界漢學中的卓越地位，那麼我們將會受到譴責。相反，透過在北京設立一個法國漢學研究所，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把法中學者團結在一種研究精神和廣博的研究之中，以維持和確保法國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¹ 雷恩的這一建議得到中法雙方的重視。1940 年 1 月 18 日，北京中法大學校長李麟玉和法國駐華使館秘書鮑思頌 (R. de Boissezon) 分別以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中法兩國代表團主席的名義，做出設立北京漢學研究所的決定，由旅京多年的著名漢學家鐸爾孟先生 (d'Hormon) 負責籌辦；該所經費原則上先從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兩國代表團的預算中提取。² 1941 年 3 月，日本駐華使館參贊土田豐 (Tsuchida) 通知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華北政務委員會決定將北京中法大學的校舍撥給偽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律系使用，要求戈思默儘快找到一個方案以滿足地方當局的這一要求。³ 北平日偽政權的這一舉動加快了法國政府決定設立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的步伐。是年 9 月 1 日，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在北京市東皇城根前中法大學舊址內親自主持成立儀式，宣布中法漢學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鐸爾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 D. Rhein, Consul de 2e Classe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Pékin, à M. Henri Cosme,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à Changhai, le 23 août 1939,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pp. 130-135.

2 "Décision de la Commission mixte des oeuvres franco-chinoises," Peiping, le 18 janvier 1940,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p. 262.

3 "Télégramme de Cosme," Pékin, le 26 mars 1941,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Guerre 1939-1945, Vichy / E-Asie, Chine*, v. 172, p. 88.

孟擔任所長，法國大使館派中文秘書杜柏秋（Dubosc）負責行政事務。安南政府對此事亦甚為關心，特派畢業於巴黎大學文學院的史浪沫（Schlemer）前來協助，擔任該所秘書。

中法漢學研究所剛成立時只設立民俗學組，由留法歸國、時任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的楊堃教授負責。該所研究人員一部分為京城內對法國學術有興趣的中國學者，一部分為法國及越南派來的法籍公費留學生，他們在中法學者指導下從事漢學研究。⁴此後，在法國駐華使館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的規模不斷擴大。是年11月，設立法文研究班；次年9月，相繼成立語言歷史組和通檢組；1943年5月22日成立漢學研究所圖書館。

抗戰勝利後，鑒於美國在華教會大學——燕京大學恢復上課，原來從燕京大學過來的一批中國教授以及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隨之先後離開研究所返回燕大。這對漢學研究所的工作無疑造成重大的影響，雖然由於當時一批法國漢學家和學生或從越南（如石泰安 Stein）或從法國本土（如韓伯詩 Hambis）來到北京，加入漢學研究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燕京教員離開而受到削弱的研究力量。在此背景之下，為了確保漢學研究所的發展，1947年中法漢學研究所進行重大改組。是年1月22日，巴黎大學、巴黎中國學院、法蘭西遠東學院方面的代表和有關部門如法國外交部文化關係總局局長和亞太司司長的代表在巴黎大學中國學院舉行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改組問題的決議，確定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的名稱此後改為「巴黎大學北京法國漢學研究所」，⁵直接隸屬於巴黎大學；後者在巴黎中國學院內設立以巴黎大學校長為董事長的董事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督查研究所的出版和各項學術工作，並負責漢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任免。新成立的董事會成員，陣容強大，除了學界著名人士之外，也有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參加。董事長和副董事長分別由巴黎大學校長和法蘭西學院教授戴密微（Demieville）及巴

黎中國學院院長羅得斯（Rotours）擔任，秘書為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研究員、巴黎中國學院秘書墨司它（Mestre），秘書助理為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NRS）技術助理塞吉夫人（Seguy）；董事成員有法國文化總局局長或者其代表、法國外交部亞太司司長或者其代表、法國國民教育部法國對外文化與大學關係處處長、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會長、法國亞洲學會會長巴柯（Bacot）、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兼巴黎中國學院的通訊員）柯德斯（Coedes）、法學教授、巴黎中國學院講師愛司加拉（Escarra）、法蘭西學院教授加斯帕東（Gaspardone）、波爾多大學文學院教授古魯（Gourou）、法蘭西語言研究院院士、法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吉美博物館館長格魯塞（Grousset）、法蘭西遠東學院院士勒維（Levy）、法蘭西學院教授馬斯（Mus）、巴黎大學文學院教授羅勃肯（Robequain）和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查頓（R. P. Teilhard de Chardin）。⁶決議規定研究所今後的工作方向是：1. 彙集法國學者和研究人員，以便使他們的知識更加完善，並在那裏從事有關中國遠東及中亞文明的研究。2. 要在北京創造漢學研究所必需的條件，如圖書館、資料、檔案圖片、索引等。3. 建立與中國漢學家和知識分子特別是掌握法語的中國學者的聯繫，與他們以及中國各大學、圖書館、研究機構建立緊密的學術合作。4. 與所外的其他法國漢學家和外國漢學家建立類似的關係。5. 採取一切有益的措施如出版研究成果、舉辦展覽會和演講會等來確保法國漢學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漢學研究所的法方研究人員一度希望研究所能夠繼續保留。1950年12月，漢學研究所負責人康得謀（Kaltenmark）在寫給董事會副董事長、法蘭西學院教授戴密微的信中，明確反對法國駐華總領事雅克列維奇（Jankelevitch）提出的遣返一部分法國人，主動關閉漢學研究所的建議，康得謀主張繼續留在北京，並表示不願中斷研究工作，他認為

4 北京《新民報》，1941年10月22日。

5 後因鐸爾孟和部分的在北京的法國研究人員擔心此名稱可能激怒研究所內的中國人而略去「法國」兩字，改為「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6 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Français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p. 52-53.

從當地的形勢來看，立即關閉漢學研究所為時過早，離開北京風險可能更大。⁷ 同月 27 日，中國政府發布通告，要求接受外國資助或者依靠外國補助來運行的在華文化、宗教機構需在 3 個月內進行登記，這些機構必須提供詳細的財務報告，說明經費來源和使用的具體情況以及有關物資的詳細清單。法國駐京領事雅克列維奇認為該規定對北京漢學研究所造成非常嚴重的威脅，再次要求關閉漢學研究所，他在 1951 年 1 月 2 日給法國外交部的電報中指出：「一旦圖書編完目錄，有可能就被中方收管，而法國對研究所的領導權可能也會被中國取而代之，致使該事業的發展方向完全與法國的願望背離」。⁸ 1951 年 1 月 13 日，北京漢學研究所董事會在巴黎專門就清理漢學研究所與遣返法國人員問題召開會議。會上，董事會的專家和學者仍不贊成匆忙做出關閉漢學研究所的決定，認為這個問題應由康得謀與法國領事雅克列維奇根據當地形勢綜合考慮與協商。經過討論，董事會最後達成兩點意見：第一，研究所的法國人員與法國領事協商，可以自由決定是回法還是留在原來的崗位上。第二，關於漢學研究所是否關閉問題，最好由中國政府決定，法國不要搶先匆忙清理研究所。⁹ 這樣，北京漢學研究所又繼續存在將近 3 年之久，直至 1953 年 11 月 9 日接到北京市政府令其停止活動的口頭通知之後，該所才遵照法國外交部的訓令，將其藏書和資料經香港轉運到巴黎大學，最後撤出中國。

二、學術活動及貢獻

作為漢學研究的學術機構，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其存在的 10 餘年裏，為繁榮和推動漢學研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概括起來，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成效卓著：

第一，開展學術研究。在學術研究領域，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民俗學研究、中國語言和歷史研究以及編

纂古籍通檢等方面都曾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民俗學領域，漢學研究所民俗學組在著名社會學家、民俗學家楊堃的帶領下，在神祇資料、年畫資料、照像資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上成績斐然，至 1944 年時收藏的神祇資料計 3,900 餘件，共 4,900 餘張，年畫 350 餘件，拍攝照片 600 餘張。同時，民俗學組在編製民俗學分類表、日報論文通檢、雜誌論文通檢以及編纂風土全志和五祀研究等方面，也多有斬獲。其中，民俗學組在其成立後的 3 年多裏剪貼的日報論文通檢計 11,000 餘件，從各省縣誌中輯錄風土門並抄竣者計河北省 123 個縣、山東省 89 個縣、山西省 80 個縣；初稿整理完畢者，計河北省 115 個縣、山東省 83 個縣、山西省 71 個縣。此外，民俗學組研究人員還選譯西洋研究中國民間信仰宗教風俗巨著，如祿是適司鐸（Père Dore）的《中國迷信研究》、哥羅特（J. M. de Groot）的《中國宗教系統》等書，並編製人名、書名通檢及研究卡片。

在中國語言和歷史研究方面，1942 年秋成立的語言歷史組在對中國古文字——甲骨文進行潛心研究的基礎上，出版法文版《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貢獻》一書。該書對於甲骨卜辭的發現及其所反映的商代社會、宗教和文化都有所論及，書後附有甲骨文目錄，共收錄中、法、英、德、俄、日等國甲骨文研究著作 600 多種，解題 70 餘條，還有著者及書名索引，為研究甲骨文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由語言學家高銘凱撰寫的《漢語語法論》一書，運用語言學理論對漢語的語法結構進行研討，全書共 30 餘萬字，分為句法論、範疇論、句型論三編，分析了漢語的語法結構、句法句型及研究方法等問題，這是當時中國用普通語言學理論指導漢語語法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另外，語言歷史組研究人員還對清代中法外交史料作了整理，將法國大使館所存及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有關資料加以比較，編成重要檔案選輯，並附人名通檢（通檢又稱引得或索

7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p. 194-198.

8 “Télégramme de Jankelevitch,” Pékin, le 2 janvier 1951, 16h57, No. 4/5.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 190.

9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p. 194-198.

引，英文名為 index）。除上述工作外，該組研究人員亦從事一些中法學術著作的翻譯，如將法國漢學家葛蘭言（Granet）的《中國思想》譯成中文，將《呂氏春秋》譯成法文。

在編纂古籍通檢方面，漢學研究所在原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基礎上，於 1942 年 9 月成立通檢組，由聶崇岐率領，專門從事該項工作。通檢組的工作流程如下：首先由編者搜集所選書籍的各種版本，作校勘研究，並博採前人研究此書的成果；其次對全書進行標點，勾摘其主要標題名詞、所有人名、地名、書名，分別抄在卡片上，並註明其所在卷數、頁數，然後按筆畫排列付印，最後在書末附上法文與英文拼音檢字及此書各版、卷、頁推算表，便於檢查。漢學研究所自成立起出版的通檢計有 15 種，它們是《論衡通檢》、《呂氏春秋通檢》、《風俗通義通檢》、《春秋繁露通檢》、《淮南子通檢》、《潛夫論通檢》、《新序通檢》、《申鑒通檢》、《山海經通檢》和《戰國策通檢》、《大金國志通檢》、《契丹國志通檢》、《輟耕錄通檢》、《方言校箋通檢》、《文心雕龍新書通檢》。這些通檢的編纂質量精確謹嚴，後來被多次重印，為學者檢索古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第二，重視出版工作和圖書館建設。在出版方面，漢學研究所主辦的期刊即有 4 種：1.《漢學》。該刊為漢學研究所所刊，係不定期刊物，以發表所內漢學研究論文為主，於 1944 年出版創刊號，至 1950 年共出版 5 輯，之後改名為《漢學論叢》（*Mélanges sinologiques*）。2.《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目前僅見二期：1945 年 3 月出版的第 1 號，1946 年 10 月出版的第 2 號。其欄目分專著（按：實為圖書館學、目錄學或者版本學方面的專題論文）、館藏善本題記、書評、圖書介紹、雜誌論文提要、出版界消息及館訊。該刊對於我們瞭解抗戰期間我國學術研究動態和出版情況有一定幫助。3.《法文研究》。原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附設的中法

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著重介紹法國文學家及文學名著，每期有作家研究、名著翻譯或注釋、法文語法研究、書評和譯文欣賞。從第二年開始又增闢中文選讀欄目，將中國文學名著選譯成法文。自 1943 年 1 月起改屬漢學研究所發行，由月刊改為雙月刊。4.《藝文萃譯》。係於 1944 年在《法文研究》停刊的基礎上創辦，將原來的中文欄目擴充而取消其他欄目，仍為純文藝刊物，側重向西方特別是法國人民介紹中國文學，透過中國文學作品，讓西方和法國人民瞭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除上述期刊外，漢學研究所還出版一些專刊，如 1946 年出版的景培元所著《說郛版本考》法文版，1950、1951 年出版的《漢代畫像全集》初編、二編等。

在圖書館建設方面，經二年多的籌備，漢學研究所於 1943 年 5 月 22 日正式成立專業圖書館，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親臨研究所主持圖書館開幕典禮，並捐贈 25,000 國幣的購書款，以表示對該所圖書館建設的重視。¹⁰在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大力搜購及各方友人的捐贈下，一年之後，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書數量即迅速增加，初具規模，所藏西文書籍計 882 種，1,108 冊，中文書籍 2,198 種，19,652 冊，裝訂雜誌 78 種，499 冊，「中法文庫」348 種，373 冊，總計 3,506 種，21,632 冊。¹¹至 1953 年研究所停辦時，圖書館的中文收藏有 45,000 冊，西文圖書達 1,300 冊，還有漢代石畫像拓本和 4,800 幅民間風俗畫。¹²並且，作為一個專業圖書館，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也有其特色：一是注重珍本、善本書籍的搜求，如足本《留青日笈》、寫本《諺有全譜》、潘氏《月令輯覽》及《婚禮便俗》、久佚之《水曹清暇錄》、明本《神仙通鑒》、《說郛》、《遵生八箋》、《京城古跡考》及舊抄本《金集禮》等。二是極力搜購叢書、類書，如《元明善本叢書》（10 種）、《續古逸叢書》（34 種）、平氏《香雪庵叢書》、《涵芬樓秘笈》、《音韻學叢書》（23 種）、《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事類賦》、《唐宋白孔六帖》、《北堂書

10 "Télégramme de Cosme," Pékin, le 27 août 1942, 18h30,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 à l'Etranger, 1940-1944*, no. 66.

11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漢學》第 1 輯（1944），頁 267。

12 Direction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Note pour la Direction d'Asie-Océanie," Paris, le 16 décembre. 1953,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 221.

抄》、《書言故事》、《耆獻類征》、《清史列傳》等等。三是重視學術雜誌的收集，如《輔仁學志》、《燕京學報》、《史學年報》、《清華學報》、《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國學季刊》、《中德學志》、《民俗》、《說文月刊》、《中和月刊》、《月衡》等均收有全份。四是中譯法文著作的搜購，特闢「中法文庫」，收藏法文名著中譯本。此外，圖書館還從事漢代石刻畫像拓片的搜集，計有數十種，約有 300 餘幅。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的圖書建設不但為當時國內漢學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惠澤今日的法國漢學研究。該所於存在期間及關閉後，曾多次將其出版物和收藏品通過各種途徑寄往法國，這些資料大部分為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收藏，對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成為世界漢學研究重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此，法國有關機構和漢學家都予以肯定，如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在介紹其圖書館藏書時就坦承，北京漢學研究所撤回法國以後的圖書饋贈，使研究所擁有非常豐富的古籍典藏。戴密微在其所撰寫的〈法國漢學研究史〉一文中也認為，北京漢學研究所贈送的圖書資料正好彌補了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書中的不足。¹³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戴仁（Drège）在追述法國漢學發展歷史時，也充分肯定北京漢學研究所的圖書資料對法國漢學所起的積極作用，他指出：「50 年代，通過剛剛運回國內的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特藏，該圖書館（即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引者注）的藏書量大幅度地增加。」¹⁴

第三，開展學術普及與推廣活動。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普及學術方面所做的一項重要活動是舉行公開學術講演會。1942 年 10 月 14 日，北京漢學研究所舉行第一次法文公開學術講演會，由裴化行司鐸（Henri Bernard）作題為「法國舊日天主教會在中國學術上之貢獻」（L'Oeuvre scientifique de l'ancienne mission française en Chine）的演講，講演時還配以幻燈片放映北堂圖書館所藏的 24 種西文名著，以供聽眾參考。同年 11 月 7 日舉行第二次法文公開學術講演會，由羅學賓司

鐸（Pierre Leroy）作題為「深海之生物」（Les grands fonds marins）的演講，介紹 19 世紀中葉以後海洋生物學的發展概況和深海動物的特徵，並配以幻燈照片。1943 年 10 月 16 日舉行第三次法文公開講演會，由上海震旦大學教授韓瑪諾司鐸（de Breuvery）主講，題目為「自然地理對於現代中國經濟之阻力」（La résistance de la géographie à l'économie moderne en Chine），認為中國某些地方存在的天然阻力影響經濟的發展，工業合作也許是解決途徑之一。第一次中文講演於 1943 年 1 月 16 日舉行，主講人為華北編譯館館長瞿益錯，演講題目是「漢畫像中之鄉亭組織」，透過畫像說明漢代的政治制度，解釋亭與縣之關係，同時展覽山東東阿、曲阜、稷山等地新出土的漢畫像拓片，以資參考。第二次中文公開講演會於 1943 年 5 月 29 日舉行，由王靜如演講「20 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與中國學術之影響」，介紹 20 世紀前葉法國漢學大師沙畹、高第埃、伯希和等人的研究及其著作、漢學研究方法的演變和法國漢學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第三次中文公開學術講演會於同年 12 月 11 日舉行，由孫楷第發表「中國傀儡戲之起源及其發展」的演講，講述喪家樂與傀儡戲起源之關係、漢代以後傀儡戲之發展、傀儡戲的音樂，同時播放相關的幻燈片。歷次公開講演會都吸引不少中外聽眾，起了普及知識和擴大研究所影響的作用。

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推動漢學研究走向社會所做的另一項活動是舉辦公開展覽會。1942 年 7 月間，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舉辦「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將研究所民俗學組所搜藏的各種神祇資料選出一部分，加以簡單分析、研究、陳列，旨在表現神祇的不同種類及其在畫像學上的演變，共展出神祇 93 份，同時陳列與研究神祇有關的中西文參考書籍計 56 種。1943 年 5 月間，又舉辦「18、19 世紀之法國漢學書籍展覽會」，選取 18、19 兩個世紀法國漢學家代表著作 75 種予以陳列，旨在介紹和宣傳法國漢學研究發展的歷史，另在兩個圖書展覽室的板壁上陳列法國銅版原刻乾隆平定伊犁回部 14 幅，平定臺灣戰圖 12 幅，以上兩種圖畫為法國醫生貝熙業（Bussière）及北堂圖書館之藏品。1944 年

13 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史〉，[法] 戴仁主編，耿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44。

14 戴仁，〈法國漢學研究所的歷史與現狀〉，同註 13，頁 553。

7月2-15日，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舉辦第三次展覽會——「明代版畫書籍展覽會」，著重宣傳和介紹中國明代的木刻版畫書籍，展品分甲乙二組：甲組所收書籍不分門類，按年代先後排列；此組圖書自永樂朝到崇禎朝，共收101種。乙組為釋道經卷，共收44種。漢學研究所所舉辦的各種展覽會，在推動漢學研究走向社會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嘗試，且收到良好的效果。

除了學術講演會與公開展覽會外，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為了向更多的中國人傳輸法蘭西文化與學術理念，於1941年11月開始設立法文研究班，對中國人進行法語教育，並向那些具備一定法語程度的中國人傳授法國的學術概況及治學方法。在教學上，法文研究班按學生的法語程度分為三個年級：1. 初級班，教材使用法國人邵可侶（J. Reclus）編的《基礎法語》（Cours de francais elementaire），並以該所精選講義為補充；2. 中級班，教材使用惠濟良（A. Hoauisee）所著《法文菁華》（Extraits des ecrivains francais）及該所講義；3. 高級班，教材為該所講義。每班人數10-20人，學生以大學生為主，還有一些機關工作人員。每年分兩個學期：上學期是10月至次年1月，下學期是2月至6月。3年畢業，研究所發給畢業證書，高級班前3名給一定數額的獎學金，中級、初級班前3名則免收學費。另外，研究所圖書館特闢「中法文庫」，供學生借閱。

三、餘言

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存在時間雖然不長，從1941年成立到1953年關閉，前後僅12年，但這10餘年正是歐洲和遠東局勢動蕩不安、法國漢學遭受嚴重挫折的年代，這就使得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國際漢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受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的影響，法國在遠東成立的兩個漢學研究機構——日本的日佛會館和越南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的學術活動均遭受重大

的影響：前者自1937年之後即處於停頓狀態，直至1962年方才恢復；後者受1941年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和戰後印度支那戰爭的影響，亦是處境艱難。在法國本土，則飽受德國法西斯統治的蹂躪，一代漢學大師葛蘭言、馬伯樂、伯希和相繼謝世。在此背景之下，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的成立，為處在顛沛流離中的中法兩國學者繼續從事漢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棲息之地，尤其是使法國漢學研究的薪火得以傳承。在戰爭期間，許多法國學者為躲避戰火，先後來到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後來他們回到法國後大多成為法國漢學界的領導人物，如1947-1950年擔任漢學研究所所長的韓伯詩後來成為巴黎中國學院即今天的法蘭西漢學研究所所長，伯希和事業的繼承者；曾在漢學研究所工作過的石泰安，回法後繼續他的道教史和西藏文化史的研究，成為當代法國最有權威的藏學家，其代表作《西藏的文明》一書，於1962年在巴黎發行，立即在國際藏學界引起極大迴響，成為世界藏學名著，並有多種譯本；1950-1953年擔任北京漢學研究所所長的康得謀回國後擔任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在宗教史特別是道教研究方面頗有影響；曾在漢學研究所學習和工作的李嘉樂（Rygaloff），回法後成為法蘭西漢學研究所教授、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語言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漢語研究在法國漢學界被稱為「先驅」；于儒伯（Ruhlmann）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法國也是頗有影響的。這些人不僅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饒有建樹，而且還培養了新一代的法國漢學家如龍巴爾（Denys Lombard）、施舟人（Kistofor M. Schipper）等。對於北京漢學研究所對法國漢學隊伍所起的承前啓後作用，曾任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著名漢學家戴密微在追述法國漢學發展的歷史時也給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法國新一代的多名漢學家都曾在北京漢學研究所受到了培養」。¹⁵由此，北京漢學研究所在國際漢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又添寫了濃重的一筆。

¹⁵ 同註13。